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

西南大学期刊社 /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项资助成果 ——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

西南大学期刊社 / 编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韩云波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 / 西南大学期刊社编.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2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1-9404-0

I. ①文… II. ①西… III. ①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2790 号

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

WENXUE YU ZHONGGUO XIAWENHUA WENJI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项资助成果

西南大学期刊社 编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韩云波

责任编辑: 秦 俭

责任校对: 杜珍辉

封面设计: 王玉菊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1 号

邮编: 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http: //www. xscbs.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印 张: 23.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9404-0

定 价: 68.00 元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任:靳玉乐

副主任:李远毅 黄大宏 欧 宾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列)

毛兴贵 文 娟 刘荣军 李远毅 张颖超 欧 宾

高阿蕊 唐益明 黄大宏 曹 莉 崔玉洁 蒋登科

韩云波 靳玉乐

《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

自然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 明

副主任:李远毅 黄大宏 欧 宾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列)

文 娟 包 颖 汤兴华 汤振金 孙 凡

李 明 李远毅 张 柯 陈绍兰 周仁惠

欧 宾 胡 杨 夏 娟 唐益明 黄大宏

崔玉洁 覃吉康 廖 坤 潘春燕

分册主编

-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文集》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毛兴贵 高阿蕊
- 《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韩云波
- 《明清史研究文集》 主 编 黄大宏
执行主编 张颖超
- 《教育学研究文集》 主 编 李远毅
执行主编 曹 莉
- 《心理学研究文集》 主 编 李远毅
执行主编 曹 莉
- 《“领跑者5000”论文集》 主 编 欧 宾

本丛书是《西南大学学报》改版10年来,首次精选所刊发的各学科领域代表性论文编纂而成的系列文集,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办刊的成绩,并作为创刊60周年的纪念。

《西南大学学报》的前身是创自1957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西南农学院学报》,两刊都属1949年以来,创办时间最悠久的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1985年以后,随着两校办学的发展,先后分别改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西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至2005年两校合并组建西南大学,各自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2005年,世所熟知的“西师”“西农”两校,皆源出于1906年创建之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在各经百年发展后,又重新融合,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在2016年迎来合并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这12年间,随着西南大学成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并获准为“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原来的两刊也变更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秉承“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的校训,以新的面貌继续发挥着

沟通西南大学与学界、业界的纽带与桥梁的作用。

两刊创立伊始,就以繁荣学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宗旨。几代编辑同仁数十年如一日,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孜孜矻矻,甘作嫁衣,以广交天下英才,提高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准,扩大期刊学术影响力,使之成为学界重要成果的主要发表平台为追求。以今视往,《西南大学学报》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导向作用、优秀学术成果的推广作用、对外交流中的形象作用、对学术人才的扶持作用、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水平的窗口作用日臻显著,也锻炼了一支业务精湛的学术型编辑队伍,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可。《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第一届重庆出版政府奖”,获得“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称号,作为重庆市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的代表性刊物,在全国同类学术期刊中位居前列。《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近年来四次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多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及“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称号。两刊多次被重庆市评为一级期刊,2012年以来各年度均获得重庆市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总结和展示两刊60年来的办刊成绩以及组建后的西南大学办学成就,是我们编集本丛书的源起和初衷。

在2017年6月动议之时,本丛书只是基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多年设立的几个主要栏目,精选历年高转载、高被引论文,分别编集系列专题论文集,即《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文集》《文学与中国侠文化文集》《教育学研究文集》《心理学研究文集》和《明清史研究文集》5种,拟入选论文100余篇,暂定名为“《西

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建设丛书”,共一百多万字,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社科版论文集的编纂过程中,我们一直希望涵容自然科学版刊发的高质量论文,使本丛书真正成为《西南大学学报》创刊60周年暨改版10周年的纪念文集。但因编选体例难于确定,这一想法一直悬而未决。10月底,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知自然科学版第3次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即“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项目来源期刊,又新入选3篇“‘领跑者5000’(F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即各学科年度所发表论文中的前1%高被引论文)。至此,共有30多篇论文入选“领跑者5000”项目,既体现了自然科学版的学术影响力,也落实了文集编选体例,使《“领跑者5000”论文集》与前5种社科文集一起,共同构成《西南大学学报》建设丛书》的完整面貌。

本丛书的编纂,固然是基于本刊同仁数十年来励志耕耘的心血,也有赖于西南大学领导、各院系及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学界大批专家学者的信任,以及业界先进的指引,我们对此深怀感激。这次旧文新刊,就是一次总结性的汇报。“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希望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导,使我们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西南大学期刊社

2017年12月

- 001 上 篇 语言文学研究
- 003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 吕 进
- 014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 王桂妹
- 024 压抑与反抗:身体美学及其进展 / 代 迅
- 043 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 / 王本朝
- 056 兴即呼:对中国传统诗学一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 / 陆正兰
- 069 论梁代诗人王筠 / 黄大宏
- 080 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批评 / 童庆炳
- 092 《诗刊》与“上园派”的形成及其影响 / 蒋登科
- 104 图像意识的四种形态及其认识论阐明 / 肖伟胜
- 121 上海租界的空间权力与文学书写 / 李永东
- 140 现代传媒语境下的语言与图像表述 / 朱全国
- 151 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 刘保昌
- 166 口述历史与语言学 / 陈 墨
- 203 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 / 李建平,张显成

227 下 篇 中国侠文化

229 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 / 严家炎

242 《留东外史》的“武侠小说”叙事语法

——论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创作的转型 / 李东芳

256 美学修改与道德修改：论金庸小说再修改 / 寇鹏程，韩云波

266 华语武侠巨制的产业意义与市场策略 / 刘 帆

277 大陆新武侠呼唤“后金庸时代” / 汤哲声

287 明代泰州学派与“侠”略论 / 何宗美，张 娴

306 “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 / (德)顾 彬著；杨青泉译，朱寿桐校

316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 韩云波

342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 高 玉

359 后 记

上
篇

—
语言文学研究
—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吕 进

摘 要：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

中国现代诗学需要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宣战，向伪诗学宣战，向商业化和“窝里捧”的诗评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探讨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

中国正处在文化转型的时代。旧“型”文化日趋消解，新“型”文化浮出水面。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在 20 世纪现代转型的排头兵和急先锋，新诗在“转型”上的文化价值已是不争之论。然而，这一价值绝对不能取消这样一个艺术事实：排头兵只是排头兵，急先锋只是急先锋，不到百年历史的新诗只是有待成熟与有待完善的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和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而已。和后起的小说、散文等文学品种相比，新诗在中国读者那里获得的认同度很不理想，新诗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危机在近百年间不断地去而复来。

呼唤新诗的二次革命，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这三个问题,关涉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存亡。

一、关于诗歌精神重建

从诞生以来,现代诗学就在重建属于自己时代的诗歌精神。在比较长的时期里,新诗比古诗更加强调诗的政治属性,更加看重“大我”,更加张扬“炸弹”和“旗帜”的社会功能。这是现当代中国历史环境使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需要历史地研究历史问题。离开历史条件的空论,主要是作秀,是没有价值的耸人听闻之论。应当说,在多灾多难的中国,除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关怀,诗别无出路。在生存的苦难下,在战争的硝烟中,在革命的大潮里,诗不可能脱离民族的忧患去一味地抒发生命关怀。离开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将是危险的。但是,以“文革”时代为极致,庸俗社会学困扰着、折腾着、毁灭着诗歌。许多诗歌偏离了艺术本质和艺术轨道,成了单纯的政治工具和传声筒。在20世纪的新时期,现代诗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获得精神大解放。诗学界批判“左”的桎梏,革除思维惰性,打破习惯定势,围绕诗歌本体解决了一系列诗学理论问题,推动诗歌摆脱长期以来的诗外承载,使诗得以回归自身。

新时期是人们精神解放的重大节日,所有既存的一切,都要在新时代的精神法庭上接受审判,由严峻的时代法官判定:继续生存,还是失去生存的权利。现代诗学也是如此。

但是,从80年代后期始,有点出乎意料,新诗渐入困境。于是,精神重建中的某些偏颇也暴露在人们面前。新诗出现的精神危机主要表现为新诗的社会身份和承担品格的危机。在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新诗又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社会与时代。诗回归本位,当然是回归诗之为诗的美学本质,但绝不是回归诗人狭小的自我天地。

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诗是一种心灵性、情感性很强的非常特殊的文学品种。如果说,散文是世界的反映,诗则是世界的反应。“反映”更具客观性和逻辑性,“反应”更具主观性和随意性。和散文相比,诗最缺乏宏大叙事的本领。散文叙述世界,

诗吟唱世界。散文的第一原则是情节，诗的第一原则是情感。散文具有较强的历史反省功能，诗则以它对世界的情感体验与心灵发现来证明自己的优势。散文作家将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作品中还原为外部世界，使他的故事虽非实有之事，却是应有之事；诗人却是文明的原始人，开放五官的通感者，他的美学使命是化客观为主观，化事件为体验，他的旨趣不在世界本来怎么样，而在世界在诗人看来怎么样——诗的世界是诗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有许多“不似”，它是以不似而似之的艺术；散文家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审美评价淹没在叙事里，诗却是直接地将审美评价作为诗的内容；和音乐这种无语言的节奏相反，散文是无节奏的语言，而诗是有语言有节奏的艺术。但是，无论有多么个性化的文体特征，诗却与其他文体一样，与社会、与时代处于无须、无法割断的联系中，其区别无非是联系渠道的不同而已。并非诗一沾上社会与时代就会贬值甚至毫无价值。因为：首先，诗是一种社会现象，诗人总是属于自己的时代；其次，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读者要求诗不仅具有生命关怀，也要具有社会关怀；最后，中国诗歌史、新诗史上的不少名篇佳作都是以艺术地关注社会、拥抱时代获得读者承认和喜爱的。拒绝所有社会和时代维度的诗学和曾经长期流行的庸俗社会学诗学一样片面而荒唐。

诗不应充当政治和政策的工具，但是也不应与社会和时代脱离，更不应将此一隔离当作诗的“纯度”。当下的中国正处在文化转型的剧变期，政治文化、体制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狭义文化都在发生巨变。文化转型冲击着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及其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促进竞争、创新、效益、个性等新的观念产生，但是它也易于诱发道德评价的失范。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作为心灵艺术的诗歌理应在这个大时代背对嘲弄意义、反对理性、解构崇高、取消价值的思潮，承担起自己的美学责任，创造中国诗歌的现代版本和现代诗歌的中国版本。应当指出，中外优秀的诗歌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不纯性”——杰出的诗人不但要关怀艺术技法，更要关怀人的终极价值，发挥公共文化人、社会良知的功能，通过诗的渠道投入时代大潮，消解旧价值观，建构新价值观，参与对现实的“诗意的裁判”（恩格斯语）和人们“人性地栖居在这大地上”（海德格尔语）的精神家园的建造。

和其他文学品种一样，诗歌与政治是一种对话关系。诗逃避不了社会

和时代,但是诗歌又常常超越现实政治。诗通过对生命的体验发挥政治的作用又影响于政治,诗以它的独特审美通过对社会心理的精神性影响来对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内在地发挥自己的承担责任,实现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成为社会与时代的精神财富。拔掉诗与社会、时代的联系,就是从根本上拔掉了诗的生命线。

诗歌园地里正常的生态平衡是:有大树,也有小草。由诗的文体可能所规定,除了国难当头,一般情况下,相当部分诗歌作品肯定不愿选择社会和时代的重大事件作为直接题材,更多的诗是对人性、人情、人道、人格的咏唱。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生命关怀的诗作之所以优秀,就在于它们往往有两个通道保持着与人群、人际、人世、人间的连接。

第一个通道是它们的普视性。诗的生命在诗中,而不在诗人的身世中。诗人发现自己心灵的秘密的同时,也披露了他人的生命体验。他的诗不只有个人的身世感,也富有社会感与时代感。这样的诗人就不会被社会和时代视为“他者”。对于读者,诗人是唱出“人所难言,我易言之”的具有亲和力与表现力的朋友与同时代人。难怪朱光潜要说:“普视是不朽者所特有的本领。”^[1]

另一个通道是诗人的自我观照和内省。诗离不开诗人的个性张扬。但是,这一张扬显然要以自我观照和内省为条件。对于诗人而言,自我观照和内省的过程就是以社会与时代的审美标准提炼自己,提升自己,实现从现实人格向艺术人格的飞越与净化的过程。现实与艺术之间总是存有“缝隙”。现实不等于艺术,现实人格不等于艺术人格。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是否出现,取决于诗人对自己的提炼程度,取决于诗人的艺术化、净化、诗化的程度。1929年,闻一多在一封致梁实秋的信中这样称道宋代诗人陆游:“放翁真‘诗人’也。彼盖时时退居第二人地位以观赏自身之人格,故其作品中个性独显。”^[2]“观赏”二字的分量是相当重的。

二、关于诗体重建

诗体重建是当前现代诗学界的又一热门话题。全世界的华文诗歌界都在热烈讨论。

新诗是从诗体的突破中诞生的，它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胡适当年提出的“诗体大解放”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的。

诗在中国历来被视为“文学中的文学”，中国纯文学是具有诗化特征的文学——诗在中国文学中无处不在，散文的语言与结构受到诗的影响。尤其是散文作品都在追求诗魂——“如诗”，是对散文作品的最高赞誉。“诗体大解放”的意义远远超出诗歌范畴，它为中国现代文学杀出了一条血路。从“诗体解放”到“诗体重建”本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现代诗学的早行人刘半农在新诗出世之初就提出了“重建诗韵”的创意。从郭沫若的“内节奏”论到艾青的“散文美”论，从闻一多的“创格”论到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论，现代诗学在诗体重建上做出了巨大努力。诗人毛泽东对他提出的“新体诗歌”也多有阐述。然而，由于长期战争、动乱的外部环境的局限，更由于在理念上对“新诗”的“新”的误读。（就像梁实秋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中所说：“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如何‘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8]其实，岂止是“最初几年”。可以说，对新诗的这个“根基”的忽略是长期的。）总体而言，新诗的诗体重建在20世纪里的进展比较缓慢。极端地说，不少旧体诗是有形式而无内容，而不少新诗则是有内容而无形式。毛泽东的“迄无成功”之说，也当指诗体重建。诗体重建的缺失使诗人感到新诗诗体缺乏审美表现力（所以包括郭沫若、臧克家在内的不少诗人在晚年出现了闻一多说的“勒马回疆写旧诗”的现象），使读者感到新诗诗体缺乏审美感染力（所以不少读者在走出青年时代后就不再亲近新诗，而是去读唐诗宋词了）。

诗体问题关涉到新诗的文化身份和民族归属。以“热爱自由，反对束缚”为由来避开此一问题是无济于事的，以“大家都习惯这样写了”的懒汉心态来否认此一问题是不负责任的。“只有限制才能显出能手，只有法则才能给人自由”之论对当下的中国新诗特别适用。

有些论者以为，诗体重建就是建立现代格律诗，甚至将主张诗体重建的人称为“格律诗的代表”，显然毫无根据。

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

自由诗的冠名并不科学。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自由散文”“自由音乐”“自由绘画”“自由戏剧”的说法。凡艺术都不可能享有无限自由，何况是